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2.015

新媒体视阈下我国高校体育智库 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

米雄辉, 谢亚平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高校体育智库具有影响体育政策、储备体育人才、非营利性、独立性等特征。在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体育智库运用新媒体扩大影响力的观念淡薄,平台类型选择较少,信息传播内容单一,仍然处于发展与探索的初级阶段,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参与决策咨询能力不强,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低,且参与决策咨询方式单一,参与程度低,参与的制度渠道有限。基于此,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应建设体育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体育信息研究与传播的融合;完善体育决策咨询制度,整合体育决策咨询和体育科学研究两大系统;实现一流学科与高端体育智库双向联动机制;拓宽智库资金来源渠道,实现多元化资金来源;创新体育智库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多领域人才储备。

关键词: 新媒体; 高校体育智库; 决策咨询; 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 G80-0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2-0116-07

引用格式: 米雄辉, 谢亚平. 新媒体视阈下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2): 116-122.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s New Physical Education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MI Xionghui, XIE Yap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ports think tanks are characteristic of influencing sports policy, reserving sports talents, non-profit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less sports think tanks in China consider using new media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they choose few types of platforms,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single, they are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is uneven;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and consultation is not strong, the conversion rate of research results of think tanks is low, and the way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and

收稿日期: 2019-11-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制度设计研究”(17YBA132);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健康中国背景下湖南省高校体育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制度设计研究”(XSP19YBZ049); 湖南省教育厅资金资助项目“基于知识管理模型的高校体育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路径研究”(18C0481);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基金资助项目“乡村振兴视阈下湖南省体育专业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S201911535046)

作者简介: 米雄辉(1977—), 男, 湖南新化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及体育智库; 谢亚平(1978—), 女, 湖南湘乡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consultation is single,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s low, and participation is low. There are limited institutional channels. Therefore, sports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uild a sports big data sharing platform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formation research and dissemination; improve the sports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system, integrate the two systems of sports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and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 realize the two-way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high-end sports think tanks; broaden the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ink tanks for diversified funding sources, innova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of think tanks for multi-disciplinary talent reserves and others.

Keywords: new media;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ports think tanks;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对高校智库“政策建言”“舆论引导”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以此确定新型高校智库发展的目标定位。2015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首次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体育工作布局中增加了“体育智库”的内容。2017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高端智库(2018—2020年)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布。

在新媒体的社会背景下,网络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高校体育智库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播,实现与受众的信息互动,采取不同的传播模式和多样的传播渠道,以达到体育信息与数据传播的最大化与最优化目标,这是新媒体时代高校体育智库扩大影响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关于体育智库的研究主要从体育智库相关概念的界定、体育智库的分类、体育智库的发展现状与运行机制、中国高校体育智库建设路径等方面展开,而较少有研究关注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建设与新媒体的融合。基于此,本文以新媒体为视阈,在深入分析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高校体育智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 高校体育智库及新媒体概述

根据宾夕法尼亚《全球智库报告》中设立的“最

佳大学附属型智库”的分类,本文涉及的“高校体育智库”在国外普遍意义上被称为“大学附属型体育智库”^[1]。根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指示,2014年教育部发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明确提出了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推进计划等,体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依据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上述批示和推进计划,结合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背景,积极探索高校体育智库建设在新机遇下的不同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本研究认为:高校体育智库指在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设立在高等院校内部的获得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各省市区政府等国家级、省部级单位认证的从事体育治理和体育政策方面研究或提供体育数据资源的、以服务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研究目的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或研究所。

高校体育智库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影响体育政策。高校体育智库可以全过程地影响国家公共体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在公共体育政策制定前期,高校体育智库可以通过开展前瞻性研究,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走势,推动重大公共体育纲领性文件出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少数民族地区体育资源的开发等都需要高校智库专家参与^[2]。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3]的起草和制定就是在广集众智、由多个健康体质专家为首的多所高校体育智库参与下完成的。在公共体育政策制定过程中,高校体育智库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多方案的政策选择,并对政府提出的公共体育政策进

行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弥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在知识、信息、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实现民主决策,并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在公共体育政策颁布实施前,可以通过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即将实行的公共体育政策的意见,对即将实行的公共体育政策效果进行预测与评判,与此同时,开展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公共体育政策颁布实施后,高校体育智库可以对政策实施后的公众反应开展调查,了解政策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态度与意见,监察与评估已经颁布的体育政策的实施效果^[4]。第二,储备体育人才,引导体育学科发展。高校体育智库存在的意义在于搭建体育知识界与体育政策界的桥梁。作为体育知识界的大本营,高校体育智库具备体育学科齐全、体育人才储备丰富、基础理论研究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等优势。第三,非营利性。高校体育智库虽然需要通过获得国家财政拨款、社会组织机构捐款、承担政府课题项目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以维持组织机构的运作,但是其本身并不以营利为目的。高校体育智库主要以体育科研成果的应用为目的,其评价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被决策部门采用以及采用后是否产生积极效果。第四,独立性。高校体育智库与决策机构应保持适当距离,以确保政策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此外,政府和学校提供给高校体育智库相对稳定的经费和人力支持,高校体育智库秉持学术研究的严谨和社会责任,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确保体育政策研究的客观、中立,尤其在为政府建言献策时,需保持智库组织的相对独立性。第五,把握体育政策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性。体育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除了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更需要创新思想观念。只有站在学术前沿,才能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课题研究提供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战略决策咨询。

“新媒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并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它是相对如杂志、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数字化传媒。目前,新媒体社交平台主要有微信、微博、博客、Twiller和

Facebook等。

二 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发展存在的问题

吉本斯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的概念,并认为“知识生产模式2”不同于以单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1,其强调应用情境下知识生产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等,将大学的使命和价值演绎到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5]。中国高校体育智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我国体育科研系统和体育决策系统搭建沟通平台,建立联结,实现信息互通、协同合作,体现体育知识的社会价值,为体育决策服务。高校体育智库的学术研究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如果没有媒体作为体育智库思想传播的桥梁,其研究成果、咨询报告想要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政府的批示与采纳是比较困难的。在实践中,高校体育智库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一) 新媒体运用观念淡薄,平台类型选择较少,信息传播内容单一

我国高校体育智库发展存在不平衡趋势,一些汇聚较多知名专家、资源广泛、实力雄厚、从传统学术共同体向高校体育智库转型较好的机构在建设过程中较为重视网站、微信以及微博等媒介平台的传播作用,较早认识到新媒体对智库成果传播影响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多样化选择。如近几年致力于为体育产业从业者提供资讯、政策咨询、体育商业模式、营销策略、活动赛事等系统化服务的北京大学国学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其在微信公众号、视频传送等方面已实现智库成果与信息的新媒体传播。但是据调查,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体育智库甚至是致力于打造高端体育智库的多个高端体育研究中心仍然注重向上和向内传播的理念,媒体意识淡薄,有些体育智库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

(二) 发展与探索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虽然国家已经连续颁布促进高校智库发展的一系列文件与指导性纲要,智库建设与发展理论体系日趋成熟,但我国体育智库发展仍处于探索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实践运作经验缺乏。近年来,为加强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满足体育改革对体育决策咨询的需求,以高校体

育专家为依托的一系列体育智库在国内一流大学或正在筹备或已经成立。如2016年4月, 北京大学国学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为我国体育各领域提供了行业分析、决策咨询等服务; 2015年,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为我国体育文化与国家体育政策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2015年5月, 天津体育学院成立的青少年体育研究中心对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为实现体育智库对策研究与政府需求的无缝对接提供了通道; 2016年1月, 清华大学成立的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围绕体育产业发展战略、体育产业资源整合、体育产业生态圈建设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此外, 2016年, 国家体育总局大力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智库, 2017年12月,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高端智库(2018—2020)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2016年1月, 黑龙江冰雪智库联盟成立; 2017年8月, 我国首个以“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为主题的特色新型体育智库平台成立。这些体育智库大部分以高校体育智库为依托而建立, 发展至今仍处于探索阶段。

上述高校体育智库的体系建设比较完善, 其大多是在适应新形势下单独设立在高校的协同整合型高校体育智库平台, 而不是在原有体育研究中心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新建立的高校体育智库侧重对现有研究人员构成进行合理配比, 吸纳如政府、企业等研究人员, 研究背景更多元化, 并聘用各领域内学者任职, 以研究课题的形式在决策咨询、战略规划、项目研究、专题调研、培训宣传等多个领域开展服务, 满足政府决策咨询多元化需求。此类高校体育智库发展起点较高、定位较广, 其首席研究专家一般为体育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与专家。但是, 对于有些从研究所、研究基地演化而来的高校体育智库, 在运作过程中, 可能遭遇各种现实困境, 如缺乏资金来源、各领域人才缺乏、研究人员构成比较单一(其成员大部分来自本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评价体系固化等^[6], 研究人员的关注点主要为学术论文发表、课题申报、职称评聘等, 开展决策咨询的动力不足。也就是说, 此类高校体育智库仍然属于科研组织, 遵循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范式, 研究人员更适应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

(三) 参与决策咨询能力不强, 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低

现阶段, 我国高校体育智库虽然客观上具备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学术交流频繁等优势, 但为体育决策者生产和提供决策的知识储备仍不够, 将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可接受的决策理念或建议、进而影响和指导体育决策者的实践能力还不强。同时, 高校体育智库研究成果传播方式单一, 主要通过报刊、专著、政府招标课题等方式传播; 对政策的影响力较小, 主要以课题承包、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邀请知名体育专家参与项目任务等方式来开展。此外, 智库成果转化率低, 转化渠道较少, 具体表现在: 第一, 信息不畅通。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室或各级社科院一般拥有固定的信息渠道, 但高校体育智库缺乏相应的信息渠道, 其研究成果很难得到决策者的实际采纳和广泛应用。第二, 人员流动性不强。“旋转门机制”^[7]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 国内较多学者也提倡在我国实行“中国式旋转门体制”, 但由于体制障碍等原因, 我国高校体育智库目前几乎不存在“旋转门”现象, 我国虽然也有少数高校管理人员到政府部门挂职, 但鲜有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系统实现身份的转换。因此, 决策者缺乏相关的信息渠道来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而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也得不到实际应用^[8]。

(四) 参与决策咨询方式单一, 参与程度低

我国高校体育智库一般以课题申报、公共体育服务购买、行政指令等方式为体育行政部门提供调研、咨询服务, 围绕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高层次的应用对策研究和战略咨询, 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在参与决策咨询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参与决策咨询方式比较单一。参与决策咨询主要有如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单项式。体育决策部门一般在决策之前会接受或者考虑高校体育智库专家的建议, 专家并没有参与决策咨询的空间。第二种是松散式。体育管理部门为完成某一个项目或者课题任务而组建临时专家团队, 如奥林匹克专家易剑东教授参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工作。第三种是委托式, 即由体育决策部门确定研究

主题,然后委托某高校体育智库进行研究,政府对研究结果进行采购,如湖南省体育局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进行的湖南省体育产业数据专项调查工作^[9]。此外,高校体育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程度较低,如《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中国除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体育官员外,没有任何学者参与^[10]。在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渠道方面,当前我国高校内部“划界而治”的制度壁垒很难打破,以“学术本位,学科导向”为主要价值导向的传统管理体制在长期运行中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在这样的情景下,高校体育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渠道不够畅通。

三 我国高校体育智库的发展策略

(一) 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体育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体育信息研究与传播的融合

新媒体的基本特征是在传播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播。高校体育智库需要通过新媒体实现传播,更需要借助传播后的数据反馈掌握公众的思想和观点,从而为新观点、新思想的产生提供源泉。因此,建设体育大数据共享平台是高校体育智库研究者和政府体育决策者的共同期望。建立多领域、全方位、大众化的体育数据平台,将更便于供求双方的沟通交流,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高校体育智库通过体育数据共享平台向政府体育决策部门提供情报、咨询报告与信息,政府体育决策部门向高校体育智库开放部分统计数据和公开决策过程。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鼓励高校体育智库进行多领域知识融合、数据共享等发展与创新,体育数据共享平台能够不断提高高校体育智库、政府体育决策部门的知识管理能力,保证双方知识、数据及信息畅通无阻。因此,高校体育智库应重视新媒体技术的传播影响力,建立自己的体育学术网站,为政府体育决策者、相关学者、受众等提供访问入口,并公布其研究领域、研究项目、研究成果、组织机构、专家库组成人员等信息,运用微信、微博以及论坛等交互式体育知识共享平台的在线反馈功能,开展与受众的知识共享、观点交流等互动,并借助体育大数据共享平台发布学术会议、专家演讲等影像资源,提高服务政

府决策的影响力,实现体育信息研究与传播的融合发展。

(二) 完善体育决策咨询制度,整合体育决策咨询和体育科学研究两大系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体育改革持续深入,协会实体化改革次第展开,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应运而生,体育总局机关模式与运行机制大幅调整等。在这一系列的体育改革中,都需要科学化、民主化的体育决策,体育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是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前提条件。体育决策咨询是决策咨询主体通过科学研究和客观、独立的分析,运用所具有的体育专门知识、体育专业数据信息、运动技能和经验等智力资源,协助政府及政治领导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公共体育决策问题的咨询服务活动,包括咨询主体、咨询客体、咨询内容和咨询手段。咨询主体指具有深厚体育理论系统知识、掌握体育前沿发展动态、具有专业运动技能相关知识的体育界知名专家、学者及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值得说明的是,只有在这些专家和研究机构得到决策者的重视并赋予其重要咨询责任时,才能被称为决策咨询主体(决策咨询人员或决策咨询机构),而这些决策咨询主体的有效运行才能构成决策咨询系统。体育决策咨询系统是政府体育决策过程中所倚重的体育专家、知名学者及体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如高校体育智库、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研究中心等的总称。目前,我国体育知识界和权力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体育科技的主要信息大多掌握在专家或专业体育智库手里,体育决策者在决策时存在知识不足的情况,因此,正确认识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为理解现代体育决策的关键。科学咨询,即向专家或者专业体育智库征求专业意见,也就成为提高体育决策效率、促进决策科学的关键。体育政策的决策咨询应当遵循科学决策的程序:确立目标、拟制方案、选择决断、执行反馈^[11]。实现以上科学决策咨询程序,应建立新的高校体育智库、体育科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中心,加强政府体育决策部门、体育科学研究部门以及高校体育智库三者间的合作,加快体育决策咨询和体育科学研究两大系统的整合,形成知识与决策两

大系统的互补机制。

（三）建立一流学科与高端体育智库双向联动机制，打造高端体育智库

一流体育学科孕育和支撑高端体育智库建设，高端体育智库促进和引领一流的体育学科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作出部署；11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通过，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高端智库（2018—2020）建设实施方案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实施体育高端智库建设方案。浑厚的历史底蕴、权威的首席体育专家、丰富的校内外研究资源、卓越的智库研究成果、一流的学科地位是高校体育智库申报体育高端智库的重要优势。学科是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序的知识体系，通常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和教学科目^[12]；而智库是相对独立的、从事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影响政策过程和公共舆论的非营利性的实体性研究机构。高校体育智库因其在体育学术资源、体育人才、话语权独立性等方面的特殊优势，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高校体育学科建设强调体育实践应用即智库功能，而高校体育智库建设则需要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在人才培养方面，体育学科强调对学生体育理论知识的系统培养，但在实践环节存在一定的薄弱现象；而高校体育智库刚好能弥补政策科学类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在科学研究方面，高校体育学科建设专家倾向于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钻研，容易出现“划界而治”的学术壁垒；而高校体育智库刚好以任务为导向，以项目为索引，善于整合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体育研究专家协同作战，能有效整合不同学术资源，不断创新科研能力。在社会服务方面，体育学科更注重体育的学术地位和声誉，参与决策咨询的能力不强；而高校体育智库以一流体育学科为依托，将体育学术创新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咨询报告，为一流学科的持续发展注入现实动力。在体育文化传承方面，一流体育学科注重弘扬传统体育文化，遵循体育学科的价值导向；而高校体育智库则在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范围内具有更广泛的作用。从国内外一

流大学的实践经验来看，国外一流学科发展与高端智库建设已经形成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局面，两者的协同互动已成为一流大学发展的常态。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就是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商科、环境与生态学为一类支撑学科，已形成学科与智库研究人员联合聘任制度、内部旋转门制度、学科交叉矩阵制组织等一系列联动制度。胡佛研究所就是以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为依托，斯坦福大学也是通过胡佛研究所将研究领域向外扩大影响，提高声誉^[13]。在国内，凡是学科与智库紧密结合、相互支撑的，通常会形成学科快速发展、智库影响力显著提升的双赢格局，如正在积极申报国家体育总局高端体育智库的一些重点体育高校。因此，加强一流体育学科与高端体育智库的互动机制建设，是发展高校体育智库的明智之举。

（四）拓宽智库资金来源渠道，实现多元化资金来源

当前，我国体育智库资金大多为政府公共财政拨款，民间体育智库资金则大部分是自筹所得。我国高校体育智库由于受行政化管理制度的羁绊，缺少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比而言，国外高校智库的研究资金来源渠道更为多样化，其主要由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含慈善机构）和个人捐助、信贷支持、研究委托等五大渠道^[14]。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英格兰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学生学费、其他经营收入、捐赠与投资收入等。我国可借鉴国外大学附属型体育智库资金筹备方式，拓宽高校体育智库的资金来源，考虑校友资源的整合利用（如校友会或者校友基金会捐款），通过市场运作等手段来实现高校体育智库研究经费来源的多样化。除了政府财政拨款，对相关研究领域、研究专题存在需求的社会组织、个人都可以尝试开放投资通道^[15]。

（五）创新体育智库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多领域人才储备

人才是智库发展的根本，高端体育智库的首席体育专家大多是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在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公共机构长期担任公共决策咨询的专家，他们在国内外学术圈、政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湖南体育产业智库聘任湖南师范大学体育产业研究首席专家李艳翎教授担任湖南省体育产业统

计专家指导^[9], 奥林匹克专家易剑东教授参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工作等^[10]。具有创新能力的体育人才是促进智库发展、扩大智库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因此, 创新体育智库人才培养是高校体育智库发展的重要举措。对高校体育智库来说, 智库人才培养首先要确定高校体育智库人才遴选的标准, 主要包括思想品德、学术素养、专业水平、学术经历等。其次, 应制定科学、细化的体育智库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将研究成果转化和被政府采纳的次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激发研究人员的科研创新潜力, 扩大智库成果的影响力, 加强对智库的宣传。再次, 建立老、中、青相结合, 博士后、博士、硕士相结合, 知名专家、青年专家相结合的以课题任务为导向的高端体育研究团队, 注重吸收来自不同领域的体育人才, 优化智库人才结构, 积极推进智库人才储备, 提高高校体育智库人才质量。最后, 打破部门之间的体制障碍, 实现高校体育智库人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人才的相互转换, 实现中国式的旋转门机制, 解决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高校体育智库是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但现阶段, 我国的体育智库理论体系还未建立, 高校体育智库建设还处于探索初期, 还不能充分发挥决策咨询的功能。因此, 需要加强体育决策咨询制度的完善, 实现一流学科与高端体育智库双向联动机制, 拓宽智库资金来源渠道, 创新体育智库人才培养机制, 使高校体育智库成为政府体育决策咨询的智囊团, 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 朱旭峰, 韩万渠.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兴起、困境与探索: 以中国人民大学智库建设为例[J]. 高等教育评论, 2015, 3(1): 32-44.
- [2] 米雄辉, 谢亚平. 文化休闲下的云南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1): 158-161.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 [2019-06-25]. http://www.gov.cn/j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 [4] 张男星, 饶燕婷. 如何理解与建设高校智库: 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J]. 大学(研究版), 2014, 7(7): 4-9.
- [5] 迈克尔·吉本斯, 卡米耶·利摩日, 黑尔佳·诺沃提尼, 等. 陈洪捷, 沈文钦, 译.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6-53.
- [6] 汪锋. 提升我省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制度设计: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J]. 高教探索, 2016, 10(3): 37-42.
- [7] 米雄辉, 谢亚平. 新型体育智库建设对民族体育发展的促进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8): 144-147.
- [8] 梅新林, 鲍健强. 中国大学智库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25-28.
- [9] 刘伟杰. 我校获2016年湖南省体育产业调查工作先进单位[EB/OL]. [2019-06-28]. <http://www.hunnu.edu.cn/info/1009/26346.htm>.
- [10] 易剑东. 作者自白: 奥林匹克研究能成为现学吗?: 我写作《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价值与意义》的心路历程[EB/OL]. [2019-06-28].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MzMzMTQyMw==&mid=2651942960&idx=1&sn=34ccc8af46858de27692c1db25778d81&chksm=8bba5a80bccdd396fa634631f8cfb1218f6fff46656614a698af09219f5f1c9f1565ce0a9f8d&mpshare=1&scene=23&srcid=0411Wq55e3cZfaAVdcF66Nus#rd.
- [11] 黄萍莉. 国际决策咨询研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 [12] 周光礼, 武建鑫.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1): 65-73.
- [13] 汪锋. 高校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互动机制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 9(4): 35-41.
- [14] 郭婧. 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研究: 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 9(13): 71-76.
- [15] 代敏, 刘国华, 聂东方, 等. 体育智库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6, 4(4): 25-28.

责任编辑: 徐海燕